

国外濒危语言研究概述

刘海啸

摘要：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濒危语言的问题，但真正开始研究并引起学界的重视大致始于1992年。甚至有学者认为90年代将被铭记在语言学史上，这是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濒危

和消亡问题日益重视的年代。有学者将语言状态分为灭绝、垂危、濒危和安全四类。一般认为，语言濒危是一个过程，原因非常复杂。拯救濒危语言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其中语言学家的作用不容忽视。

关键词：濒危语言 语言多样性 语言状态 语言的消亡

美国语言学家穆夫温一篇论文中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毫无疑问，90年代将被铭记在语言学史上，这是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濒危和消亡问题日益重视的年代。”^①关于这一点，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也说：“显然，出现了某种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职业语言学界从来就没有掀起过如此普遍的热潮。”^②

虽然此前也有一些有关濒危语言的零星研究，但国外有关濒危语言研究的起始大致可以定在1992年。原因有二：其一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杂志《语言》(Languages)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组有关濒危语言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就是克劳斯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③。在这篇文章里，克劳斯有一句至今仍广为传诵的话：“下一个世纪将目睹90%人类语言的死亡或灭绝。”在这一年举行的第15届世界语言学家大会上，“濒危语言问题”也是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从此，全球性的研究濒危语言的热潮涌起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40本直接与此话题紧密有关的英文专著和文集了^④，这其中还没有包括用其它语言发表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互联网上得到更多、更新的信息^⑤。显然，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目前的所有成果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提到那些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观点和著作，难免挂一漏万。

大卫·布拉德利和马娅·布拉德利在他们主编的《语言濒危和语言维护》的前言中，给出了濒危语言研究和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四个理由^⑥：

① Mufwene, Salikoko 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New Imperatives in Linguistics Curricul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in a Changing Contex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30—31 October 1998.

② Crystal, David,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③ Krauss, Michael,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 (1), 1992: 4—10.

④而在同期关于语言产生的论著却少得可怜。从这种“生”、“死”不平衡的状态中，也可看出语言的死亡率颇高。

⑤以下为两个较大的濒危语言研究文献目录：<http://www.tooyoo.l.u-tokyo.ac.jp/BibLE/>, <http://www.terralingua.org/Bibliographies/BiblioMIT.htm>

⑥ Bradley, David, Maya Bradley (eds.)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London: Curzon Press, 2002)

语言学方面的理由：从语言学的观点看，我们必须记述濒危语言。如果语言未经记述就消失了，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知道它们当中是否含有某种未知或罕见的结构。除此之外，濒危语言的变化显然也会不同于其它语言，这使得它们对于历史语言学理论也有重要的价值。

民族学方面的理由：如果语言未经记述就消失了，未来的人们将无法学习他们先祖的语言，因而也就无法存取各种传统知识和文化。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我们没有权利剥夺他们重新获得他们先祖的语言和文化的权利。

科学理由：每一类社会都有自己特有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用不同的语言模式来编码的。而且，每一类社会一般存在于一个不同的生态体系中，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以及与其共存的动植物也有着独一无二的知识。如果语言没有了，所有这些也会随之而去。而这些知识的许多内容对于新的药品、食物和材料的研发具有科学价值，所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实用和经济价值。

象征理由：身份认同和自尊是极为重要的，而语言又是认同的关键。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我们认为濒危语言之所以如此引起重视，还在于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乃至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联系。克里斯特尔也将多样性列为保护濒危语言的几个理由之首，其余的理由是：语言表达身份，语言是历史的栖身之处，语言对人类知识积累的贡献，语言本身的意义。总的说来，这些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应该保护濒危语言的主要理由。

哈蒙 (Harmon)^①从心理学和哲学出发，讨论了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他认为多样性是生命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意识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意识使我们成为人类，那么也可以说由于有了多样性人才能称之为人类。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语言、没有文化的世界和地球。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同样都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有关濒危语言、语言人权的著作的前言中^②，作者说：“今天，某些语言正在被杀害，语言的多样性正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在消亡，相比而言，其消亡的速度要大大快于生物多样性消亡的速度。本书从揭露世界语言‘健康’状况的现实出发，分析了它们在未来几代人之后的前景。结论是前途一片黑暗。”这本书用大量数据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一种多样性丰富之时，另一种多样性也随之丰富，反之亦然。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呈一种因果关系。

生态学家萨瑟兰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消亡和物种灭绝关系的文章^③。他按照国际通用的研究物种灭绝的指标和方法，分析了 6809 种语言的生存状态，并比较了语言、鸟类和哺乳动物在灭绝过程的异同。有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① Maffi, Luisa (ed.)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Linking Language, Knowledge, and the Environmen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1)

②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 London, U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785 页。

③ Sutherland, W. J. 2003. Parallel Extinction Risk and Global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s and Species. Nature 423: 276—279.

名称	灭绝	危急	濒危	受到危害	数据不全	合计
语言	306 (4.5%)	438 (7.1%)	506 (8.2%)	732 (11.9%)	639	6809
鸟类	125 (1.3%)	182 (1.9%)	321 (3.3%)	680 (7.0%)	79	9797
哺乳动物	87 (1.9%)	180 (4.1%)	340 (7.7%)	610 (13.9%)	240	4630

以上数据表明,人类语言消亡的速度要高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他的另一个结论,也值得我们深思:在那些语言濒危和消亡现象最严重的国家,濒临灭绝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数量也要多于其它国家。萨瑟兰也证实了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国家同时也具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哈蒙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分别列出了世界上语言种类和高等脊椎动物种类最丰富的25个国家,他发现在这两个表中的25个国家里有16个国家是相同的,于是他认为“仅仅把这种现象视为巧合,是难以服人的”^①。

要讨论一种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首先涉及到对语言状态的分类问题。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自己的分类指标和体系,但一般采用的还是克劳斯(1992)提出的语言健康状态分类体系。该体系将语言状态分为四类:灭绝、垂危、濒危和安全。判定指标主要有:从父母到孩子的代际传递,语言人口和官方状态,其中又以有没有孩子学习这种语言最为重要。就这一方面看,灭绝的语言是已经没有人讲了的语言;垂危的语言是已经没有孩子学习了的语言;濒危的语言是现在还有孩子学,但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到下个世纪就没有孩子学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濒危语言红皮书”又将以上指标细化到更容易操作和使用的程度,即把语言分为以下七种^②:

- 已经灭绝的语言:已没有人使用的语言;
- 可能灭绝的语言:已没有可靠的信息证明还有人讲这种语言;
- 接近灭绝的语言:最多只有10个人讲这种语言,而且全是老人;
- 严重濒危的语言:虽然还有不少人讲,但其中已没有孩子;
- 濒危语言:有一些孩子在说,但数量呈递减态势;
- 潜在的濒危语言:有许多孩子在讲,但没有官方地位;
- 非濒危语言:具有安全的代际语言传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濒危是一个过程,好的做法应该是避免“潜在的濒危语言”发展为“濒危语言”和“严重濒危语言”。次一点的做法是,尽可能多地记述“严重濒危的语言”和“接近灭绝的语言”。最差的做法,就是什么也不做。

为了拯救濒危语言,有必要对语言消亡或衰退的原因进行分析。大量的实例证明,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涉及的因素众多,而且各个语言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从而很难提取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方法来。一般认为爱德华

^①转引自 Skutnabb-Kangas 2000: 88。

^②转引自 Skutnabb-Kangas 2000: 82。

(Edwards) 提出的影响语言状态的因素分析模型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模式^①。这一模型考虑了人口、社会、语言学、心理、历史、政治、地理、教育、宗教、经济、科技等领域和语言使用者、语言、环境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拟出了 33 个可能影响语言状态的变量。这些变量既含有造成语言濒危的表面因素,也包括了一些深层的原因,可算是一个用来衡量语言状态的较完整的模型。如此之多的变量,不仅会给信息收集和分析带来困难,而且各个变量在每一种语言中的权重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会给模型的使用带来困难。格雷诺布尔和惠利对爱德华模型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扩展。如,在 33 个变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识字教育”变量,但对于识字教育在保护语言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的。法国语言学家卡尔韦便认为识字教育有可能破坏语言生态的平衡,对某些语言的保护不利^②。

拯救濒危语言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这其中语言学家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不仅仅因为语言是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语言消亡只是一个更大的更严重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语言学家应该积极参与到这种活动中去,这一点已经得到不少语言学家的积极响应^③。但仍有许多职业语言学家对此问题漠不关心,认为语言的消失乃正常现象,不必杞人忧天。米尔豪斯勒(Mühlhäusler)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代主流语言学关心的主要是语言的一般原则和理论,而非具体的语言,这种倾向难免让语言学家忽视语言多样性问题。沃洛克(Wollock)也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西方语言学对语言多样性保持沉默,忽视、甚至否认在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任何联系,其根源在于西方唯名论的哲学传统。唯名论将所有的通用概念视为与现实世界没有联系的任意社会结构。在这种传统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任意的符号系统,与外部的世界几乎没有联系。因此只有改变将语言视为一种语法的观点,而把它看做是一种在社会及自然世界的活动,才有可能贴切地谈论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才能讨论语言作为文化存储器的问题^④。

如果语言学家认识到在拯救濒危语言过程中自己的职责,除了尽力记述这些语言之外,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吗?换言之,人类可以拯救濒危的语言吗?由国际著名社会语言学家菲什曼主编的同名著作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⑤。事实上,本书是菲什曼于 1991 年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逆向语言转换:帮助濒危语言的理论和经验基础》(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的延续。菲什曼为社会语言学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是社会语言学者跟踪研究语言发展的

^①本文有关 Edwards 模式的论述主要参考了 Grenoble, Lenore A. & Lindsay J. Whaley. 1998. Toward a Typology of Language Endangerment.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ed.) by Lenore A. Grenoble & Lindsay J. Whaley: 22—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Louis-Jean Calvet. 1999. *Pour une écologie des langues du monde*. Plon.

^③Dixon, R. W. M. 1998.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e, Ken. 1998.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ed.) by Lenore A. Grenoble & Lindsay J. Whaley: 192—2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见 Maffi 2001.

^⑤Joshua A. Fishman (ed.) 2001.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503.

必然产物。新的表达方式“逆向语言转换”(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简称“RLS”)的实质是希望通过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改变语言不断消亡的局势。菲什曼提出了 RLS 工程的八个阶段,并且在此框架下研究了十多种濒危语言的例子。十年后问世的这本书通过一个统一的 RLS 研究框架,更新了这些语言的现状,检验了该理论和实践架构的效果,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 RLS 理论。RLS 的八个阶段也叫“分级代际传递严重度”(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简称“GIDS”^①),阅读时的顺序为从下至上,即:始于 8,终于 1。

1. 在更高一级或国家范围内的教育、工作、大众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使用。
2. 当地及区域大众媒体和政府部门的使用。
3. 在当地及区域的工作场所的使用,包括 X 语和 Y 语人群。
- 4b. 在公立学校,为 X 语的孩子提供用 X 语教学的某些课程,但这是在 Y 语的课程设置及 Y 语教职员的控制之下进行的。
- 4a. 代替义务教育的学校,采用 X 语的课程设置和 X 语教职员控制。
5. 为老人或年轻人开设的识字学校,但不是义务教育的替代品。
6. 代际或民族集中的家庭—邻居社区:母语传递的基础。
7. 用 X 语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在社区老人中进行。
8. 重建 X 语,成人通过 XSL(把 X 作为第二语言)程序学习 X 语。

这八个阶段,不仅可以用在濒危语言的新生方面,也可以用来衡量某种语言的濒危程度。菲什曼在《濒危语言的拯救为什么这么难?》这篇文章中,从多种角度讨论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困难性,他认为:一种与传统文化联系密切的民族文化语言的消亡,通常是长期与其传统文化背离的结果,这一过程助长了语言保护主义敌对力量的形成;保护弱势语言的活动一般被认为是保守、狭隘和反现代的;为了保护一种濒危语言,它的某些作用既要区别于其强势对手,又要与其达到共享,这是难于达到和维持的;濒危语言重获的任何功能都必须同时从“上”、“下”两方面得到加强。濒危语言是可以被拯救的,但这是一项需要精心组织的社会工程。作者也提醒大家面临濒危的不仅仅只是那些小语言,世上所有的语言,其生存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该如何行动呢?克里斯特尔在 2000 年提出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六个策略:

1. 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应该增强自身在强势社团中的声望;
2. 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应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
3. 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应该使用法律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4. 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应该在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5. 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应该能够用自己的语言书写;
6. 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应该加强电子技术的使用。

不难看出,这些策略主要是针对濒危语言的使用者而言的。一个语言能否健康发展,操持这种语言的人的态度非常重要。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仅有语言学家的热情是不够的。基比(Kibbee)提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孩子的父母认为一种国际语会有望带给自己的

^① Fishman 2001: 466.

孩子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怎么才能让这些父母用他们孩子的未来冒险呢？”^①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投身于濒危语言保护领域的人应该考虑的。基比自己是这样回答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并且必须保护那些愿意维持自己语言遗产的人，但我们没有权利对那些选择不这样做的人说长道短。”穆夫温在2004年列举了语言学家在参与濒危语言拯救活动中的种种困难和必须面临的问题^②：如何考虑濒危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人权，这权利是否也包括他们能够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选择？语言新生的辩护者们也应该回答是否能够在无法重构这种语言以前的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复生或振兴语言？如同文化一般，语言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任何有关语言的活动不能忽视语言使用者本身根据需要做出的选择。如果我们把语言的消亡理解为一种“物竞天择”的自然机制，那么人类的干预可能没有作用，也是没有必要的。但就是穆夫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造成今天如此恶劣的语言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是和欧洲的殖民政策和行为密切相关的^③。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扑朔迷离的当代社会语言状况图。如何能够在尊重濒危语言使用者语言人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不仅仅是语言学家的任务，也是整个人类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外许多大学已经开设了有关濒危语言的课程，相应的教科书也开始出现。如日本学者角田太作的《语言濒危和语言新生》就是一本不错的教科书^④，主要章节有：语言濒危的程度，语言濒危的现状，语言濒危的原因，语言死亡的定义和类型，语言濒危的外部条件，语言濒危的社会语言学特征，语言濒危中的结构变化，语言遗产的价值，语言新生，研究者的作用等。

限于篇幅和资料，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些国外濒危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总之，濒危语言是应该拯救的，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义。但在具体实践中，应该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和因素，因为语言问题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我们知道濒危语言的拯救会有许多困难，但如果这和人类的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便没有理由不去做，这可能也是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参与其事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经过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世界仍然会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冯学锋

① Douglas A. Kibbee 2003 Language Policy and Linguistic Theory. in J. Maurais and M. A. Morris (eds.)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7—63.

② Salikoko Mufwene 2004 Language Birth and Deat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3: 201—222.

③ Mufwene, Salikoko 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Tsunoda, Tasaku 2005.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